

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為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 新西藏而奮鬥

第五輯

民族出版社

6044/12

09



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為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 新西藏而奮鬥

第五輯



民族出版社

1959年·北京

4125

42-5

書号：2260 (1) 102

**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為建設民主和
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而奮鬥 第五輯**

民族出版社編輯出版 地址：北京安定門外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47 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1959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59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4 90 千字 印數：1—205,000 册

統一書号：3049·69 定价：0.27 元

目 录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人民日报編輯部	1
請大家来研究尼赫魯的講話	人民日报編輯部	26
我們不能緘默		
——評印度总理尼赫魯講話	光明日报国际評論員	28
質問尼赫魯先生	中国青年报評論員	32
尼赫魯先生之言差矣	大公报評論員	38
事实愈辯愈明	大公报評論員	46
干涉者的幻想一定破灭	光明日报国际評論員	50
卑劣的誹謗	大公报評論員	53
美国煽风点火	光明日报国际評論員	57
“互相尊重”的是什么?	齐 放	59
所謂“三个因素”的背后	理 真	62
新德里的“悲剧”	朱林芷	66
讀尼赫魯先生的談話	李浩培	69
什么样的“自治”	江 山	74
痛斥干涉者	金克木	78
西姆拉會議的时代已經过去了!	永 勤	82
“冷战的語言”从何来?	荆 风	85
印度政治上的一群“狠孩”	秦 牧	88
这是什么自由?	黎明起	91
什么样的“感情”?	胡、今	93

什么是悲剧?.....	王馨源	96
如此“节制”和“智慧”.....	周新栋	98
什么样的“本能”?	王 康	100
讓事实來說話吧	严 龙	102
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苏 方	104
是誰“如此荒誕”	郑蔭增	106
当心落入陷阱	周 恩	108

附录:

尼赫魯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 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講話	110
尼赫魯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再就西藏局势发表講話	117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

人民日報編輯部

西藏少数卖国贼发动的一場叛乱战争，已經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分子所造成的流血冲突，随着他們的可耻的失敗，在西藏絕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現在，西藏正在面临着一次和平的革命，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決議所指出的西藏广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是1949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繼續。这场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因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而拖延了。在叛乱平定之后接着进行的革命，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就是說，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沒有参加叛乱的上层階級将采取贖买的政策，就跟在汉族地区对待民族资产階級的政策差不多。因为在西藏人民的背后，有全中国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亿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

現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輿論正在对西藏問題大談特談，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們認真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分光荣，讓全世界注意他們，讓他們在全世界的議論中得到教育，得到鍛煉。有些外国人說：西藏的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是“革命”，是“民族主义”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們應該获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独立”；而人民解放軍在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对于叛乱的平定，則是

“武装干涉”，是“侵略”，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希特勒”。这样說的人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各国的反动派，例如亚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吳庭樞和蔣介石（但是他并不贊成西藏独立，而要求西藏归順台湾）。还有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的一般政治态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問題上却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边，例如印度的某些資產階級分子。所有上述的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数，在本国也是少数，但是他們控制着相当大量的宣传机器，一时显得頗为嚣张。世界上更多的人說，西藏的叛乱是反动的，平定叛乱是正义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致支持中国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斗争。就是在資本主义世界，站在中国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数。他們包括各国的劳动人民，主张正义和进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对外国侵略外国干涉的民族資產階級。这些民族資產階級懂得，贊成外国干涉西藏，就等于贊成外国干涉印度尼西亚、錫兰、柬埔寨、尼泊尔、伊拉克、古巴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国家的內政，等于贊成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資本主义国家，这种正义的声音暂时沒有那批反中国的宣传机器所造成的喧声高。有些人感觉难过，好端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乱，岂不更好！他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出，西藏叛乱既然发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这次叛乱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将最終結束外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这对于中印友好的真正巩固也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对于这种不同議論，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應該認真研究，得到教訓，而且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对西藏問題大製特製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也将会加以研究，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訓。

我們現在想談談尼赫魯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本報編輯部按：在我們寫好這篇評論以後，我們讀到了尼赫魯總理5月4日在印度聯邦院的講話。這篇講話的主要論點並沒有超出4月27日講話的範圍。所以，我們沒有對這篇評論作任何的修改和補充。)

尼赫魯先生從今年3月17日到4月底，在議會講西藏問題，這是第七次了。尼赫魯先生曾經多次表示同情所謂“西藏人的自治願望”，反對中國的所謂“武裝干涉”。在4月27日，他講的話比較更有系統，本報已經在4月30日全文發表過了。為了讀者的方便，我們現在把他的話再引出一段，這段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他對於西藏叛亂和印度作用的看法的一個提要：

“情況無疑是困難的。一方面，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迅速前進的社會，而另一方面是一個停滯不前、沒有改變的、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社會。兩者之間的距離很大，看來很難有任何會合點。與此同時，某種形式的改變不可避免地來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發展了。西藏長期的與世隔絕的狀態部分地被沖破了。雖然物質上的障礙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卻增加了。顯然，沖破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的嘗試或者沒有作，或者作了沒有成功。

“如果說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層反動分子’負責，看來這種說法是把一種複雜的情況異乎尋常地簡單化了。甚至根據得自中國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亂的規模也是相當大的，這個暴亂的基礎一定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不僅影響著上層階級的人，而且影響著其他人。毫無疑問，既得利益集團參加了暴亂，並且企圖從中得利。試圖用頗為陳腐的字眼、措辭和口號來解釋情況，是很少有什麼幫助的。

“當這些不愉快的事態發展的消息傳到印度來的時候，立即引起了強烈的普遍的反響。這種反響並不是政府引起的。這種反響實質上也不是政治性的。這種反響主要是一種基於情感和入道原因的同情。它的產生也還基於同西藏人民久遠的宗教和文化聯繫所造成的親密感情。這是本能的反應。不錯，印度有些人的確企圖把這種反應引導到不當的方向，而從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應卻是明擺着的事實。如果這裏的反應

倘且如此，那么人們就不难設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許亞洲的其他佛教國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實質上不是政治性的強烈情緒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軍事方法来处理了。我們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的友誼，但是同时，我們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們对于他們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們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們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們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証，爭取他們友好合作。首先，我們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終止。

尼赫魯所謂西藏的“停滯不前的、沒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沒有說明。但是，这正是全部問題的出发点。我們的討論必須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領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資料——全部土地和絕大部分牲畜都屬於三种領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貴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都沒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牧民都沒有自己的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們自己，連同他們的子女，世代代，都分別屬於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領地一部分屬於专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担負封建政府各种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这些領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負。其余的領地是农奴主的所謂“自营地”。在这种領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帶自己的伙食）为領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領主只給一小块（約占領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給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絕大部分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并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領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剝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維持生活，因此不能不

向农奴主借高利貸。大批农奴所欠的債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經欠了几百年的債。农奴不但沒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沒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須由領主准假。

西藏的貴族是世袭的。全西藏現在有貴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財產多少而定。大貴族約占貴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們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几千个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权力始終掌握在这些大貴族手中。貴族和农奴等級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見了貴族要迴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講話也要有一定的講法，不許講錯。貴族对于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認為违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甚至还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駭人听聞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無論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須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統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貸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剝削，比官家和貴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剝削。寺院內部也是等級森严，农奴出身的貧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剝削者。寺院內也設有各种刑具和牢獄，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刑，其残酷的程度同其他农奴主沒有两样。

大致說来，貴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屬於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間，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敗現象和內部斗争。在达賴喇嘛周围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級官

員中，为了爭权夺利互相殘杀毒斃的事件層出不窮。達賴喇嘛，並不是象尼赫魯所說的那樣，無條件地被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這些人經常把達賴喇嘛當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他，在他們認為必要的时候，甚至把達賴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們知道，1855年，達賴十一世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布達拉宮暴亡；隨後，1875年，達賴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達拉宮暴亡。英帝國主義侵入西藏以後，西藏上層反動統治者傾軋異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殘酷了。1923年，班禪九世被迫終身逃亡內地；1947年，擔任了八年攝政的熱振呼圖克圖被逮捕并勒斃獄中；同年，現在穆索里的達賴十四世的父親，也因為具有愛國思想，被里通外國的反動分子為了便于控制達賴喇嘛而毒死；1950年，致力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格達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滅迹。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統治集團中外國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滯不前的，不但經濟衰敝，文化落后，連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絲毫也不“温和”，絲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動、殘酷、野蛮的制度！

試問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鬧的所謂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們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誰呢？你們所宣傳的西藏的自治或“獨立”是誰的自治或獨立呢？你們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亂的失敗是誰的失敗呢？看起來，很多所謂“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們所同情的並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壓迫者、剝削者、殘殺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腦。在西藏的大農奴主剝出農奴的眼睛和心脏来的时候，這些同情專家不覺得是悲劇，不向這些農奴主要求温和和人道。在這些大農奴主向駐守在自己國土上的

人民解放軍举行武力进攻的时候，在他們用野蛮的方法残杀被他們俘虏的解放軍战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同情家們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这些农奴主能够进行百年的游击战争，也不向他們要求温和和入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軍对于这些坚持叛乱的豺狼由防御轉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說，唯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由于武装匪徒的叛乱的失敗而最后遭遇着危机的时候，一切什么悲剧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独立呀的叫喊，就象潮水冲破了閘門一样地泛滥起来了。由此可見，进行这种叫喊的人們，除了有一些是出于誤会以外，根本是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农奴主的卫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敌人。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梅特涅(注)式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才会把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鲜李承晚、南越吴庭艳、中国蒋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我們感到惊异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魯先生，一方面显然跟这个同盟中的許多肮脏人物存在着重要的矛盾，懂得他們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魯自己的阴谋詭計，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們的所謂“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讓他們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們現在被迫在自己的評論中同尼赫魯先生有所爭辯，这是我們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魯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

(注) 克勒曼特·梅特涅从1809到1848年先后担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1815年俄国的沙皇、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和普魯士的国王为了共同镇压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級革命运动，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約，結成了所謂“神圣同盟”。后来，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参加了这个同盟。梅特涅是这个“神圣同盟”的組織者和领导人。

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例如，他在1984—1985年在狱中所写的“自传”一书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现很多误解和偏见（他自己也说，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带着在资产阶级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见”），但是他仍然承认，由于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并且说：“经济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阶级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弃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阶级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感化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鲁在这里说得很对。但是，他在1969年4月27日的讲话中却唱着一种多末不同的调子！他或者是完全抛弃了他以前发表过的见解，或者是实际上没有了解他所曾以为了解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现在责备我们没有能够感化统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而且企图把对于西藏社会的阶级分析作为“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一笔勾销，把极端对立的农奴和农奴主这样两个阶级，描写成为“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一个单一的社会！当然，尼赫鲁的这个企图是我们所无法同意的。西藏社会的阶级对立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字眼、措辞、口号的问题，更谈不上什么陈腐。改革当然要采取行动，当然要有利于绝大多数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于极少数坚决反对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万人。

其余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万人，这里面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坚决反对改革、直至举行叛乱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們已經說过，两万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胁欺騙的劳动人民（任何反革命軍隊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么，参加叛乱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以为整个西藏上层階級都叛变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这六万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贊成改革的开明人士。因此对于上层階級也必須分別情况，适当对待，这是我們一向坚持的政策。如果說，上面說的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改革都是同样担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样有障碍的，那是不合乎实际的。至于要求改革的絕大多数人，他們对于改革有什么要担心，有什么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呢？

尼赫魯在討論西藏社会的时候，虽然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否認既得利益集团在叛乱中的作用，但是整个說来，他不但沒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极端残酷的剝削制度，而且实际上把极大多数被剝削者和极少数剝削者混为一談，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否認西藏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負責，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說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錯誤。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魯所討論的問題的当事人，我們認為，指出这个錯誤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魯的邏輯，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許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許的。大家記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沒有脱离封建社会的范围。这个社会也是一向被称为停滞不前的、沒有变化的、与世隔絕的社会。有些人也曾經譏笑我們是从陈腐的、过时的、极端簡單化的和完全不合国情的外来思想——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断言我們的改革运动将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抵抗，甚至宣

布我們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國，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謂“赤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現在歷史已經作出結論：正確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所有對於共產主義者的種種攻擊和誹謗，一概都徹底地破產了。停滯不前的、沒有變化的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一變而為生氣勃勃、迅速前進的中國，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過去的停滯不前，不過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受到落后的生產關係的束縛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才真正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和祖國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稱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儘管也曾暫時迷惑過一部分群眾，却真正被證明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我們相信，中國歷史的這個結論，尼赫魯總理也是不至於反對的。但是按照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邏輯，只要他的同情不僅限於“西藏人民”，而擴大到整個“中國人民”，那麼，整個中國革命也就要變成為令人百倍難過的空前的大“悲劇”了。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的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比西藏的兩萬左右叛匪多得多，說他們不止是“上層反動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戰爭的規模也大得多，總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應該強烈得多。但是，據我們所知，尼赫魯總理在同情整個中國的時候，並沒有同情於漢族的“大農奴主”，而在同情中國的一部分——西藏的時候，却同情於西藏的“小蔣介石”。這種極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魯先生可能說我們不公正，因為他所講的只限於西藏，而西藏人和漢人是不屬的。這就是說，漢人在西藏人中間領導革命，將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礙。西藏人和漢人不同，千真萬確。不但如此，蒙古族、維吾爾族、僮族、回族人、苗族、朝鮮族人，以及中國的其他許多少數民族，也都和漢人不同。在中國共產主義者和中國政府面前，存在着國內的少

民族問題。我們是十分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的。我們用了十年的時間，培養了各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並且在漢族人民中，特別是在漢族幹部、共產黨的漢族黨員和人民解放軍的漢族官兵中，認真地進行了反對大漢族主義的教育。我們採取了資本主義世界上沒有先例的辦法，在漢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聚居地區說服漢人，建立了少數民族的自治區。例如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僮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其他的一些自治州、自治縣，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西藏，為了爭取西藏上層分子的合作，我們用了特別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時間里，一直保存着原來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軍隊甚至它的貨幣，一直說服西藏人民暫時不要進行他們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象所謂達賴喇嘛聲明所說，不給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權利，那麼，那些叛國賣國的分子早就會被逮捕懲處；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會拖延到現在。中央人民政府對那些反動分子採取了如此仁至義盡的態度，甚至在拉薩叛亂爆發以後，甚至在知道達賴喇嘛已經被劫出拉薩以後，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的部隊還是一直等到叛匪向軍區直接發動了武裝攻擊的七小時以後，才開始舉行還擊。很明顯，到了這一步，反動分子已經把和平解決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堅決討伐和平定叛亂以外，任何其他的辦法都沒有可能了。人民解放軍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薩地區的叛亂，如果它願意先下手，當然早就可以把羅布林卡包圍起來，使叛匪無法劫走達賴喇嘛。每個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會懂得這個道理，而決不會去理睬什麼兩三發炮彈打向宮殿，落入池塘的童話。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面對着這種嚴重局面，始終堅持不打第一槍的方針，正是說明了共產黨人對待民族問題始終是慎重的，對於爭取西藏上層分子尤其盡了最大的努力。這種政

策。只有革命的无产階級才能認真執行，資產階級或者其他剝削階級就是想要這樣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这里，在民族关系問題上，根本的關鍵仍然是階級分析的方法問題。尼赫魯先生希望我們“爭取他們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魯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間接地指責我們過去和現在沒有這樣作。事實上，只有革命的无产階級才能徹底地正確地解決歷史上的民族問題。民族之間的糾紛和隔閡，基本上是剝削階級造成的，剝削階級也永遠不可能消除這種現象。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革命的无产階級的正確領導之下，完全能够通過一定的努力，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切糾紛和隔閡，結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誼。中國歷史上有過長時期的民族壓迫和民族鬥爭。蒙古統治者和滿洲統治者壓迫過漢人、維吾爾人和西藏人，而漢族統治者也壓迫過蒙古人、滿洲人、維吾爾人和西藏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占人口絕大多數並且是革命主力的漢人，現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員到內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現在不是去壓迫和剝削那里的少數民族，而是跟當地民族的革命幹部在一起，幫助那里的劳动人民從本民族的壓迫者、剝削者手中獲得自由和解放，實現民主和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建立使各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繁榮昌盛起來的基礎。在這些地區工作的共產主義的漢族人員，包括人民解放軍的漢族官兵，不但沒有騎在少數民族人民的頭上擺威風，相反，他們是跟當地民族的革命幹部一道，做少數民族人民的勤務員。他們常常不避艱險，同少數民族的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為他們的權利和幸福而鬥爭。這樣，各少數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及各少數民族的一切愛國的、贊成改革的上中層分子，就同漢族的劳动人民聯合一致，象漢族人民一樣地推翻了他們本民